

导 论

一、民主式的贵族制与贵族式的民主制

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寡头制(即绝对君主制)是建立在一个人的意志之上的。一人发号施令,其他人欣然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否决全国人的意志,即使在今天,我们仍可在立宪君主政体所给予君主的立法否决权中找到寡头统治的痕迹。这种体制以某种超世的、形而上的神秘主义作为自身的正当性依据。君主制的逻辑基础往往诉诸于天国神旨。上帝从天国降临人间,成为君主统治的坚强柱石,并赋之以上帝的恩典作为其宪法基础。所以,从宪法的角度看,只要君主体制是建立在对超世的本体论诉求基础之上,那么这一体制就是永久的和不受怀疑的,而且不受任何人定法或人类意志的左右。因此,君主制在法律上、司法上以及正当性上是毋庸置疑的,而试图对之提出质疑只能是愚蠢的政治幻梦。从法律上说,只有上帝才有资格废除君主统治——在这里,上帝的意志是不受制约的。

从理论上讲,与君主制原则直接对立的是民主制,后者否认任何绝对的权力。抽象点说,它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人在社会的阶梯上都有上升的机会,从而保障整个共同体的权利。民主体制在法律上否定任何形式的血统论,主张人类社会中个人能力是决定一个人身份地位的惟一要素。而君主制则将

所有的赌注压在一个人的品质上，这就使得即使最好的君主制政府也不能保证整个民众的永久福祉和技术上的有效统治。而从原则上讲，民主制度能够对整个共同体进行有效统治，在其中，人民是惟一的最高仲裁者。

今天看来，在各民族发展的历史上逐步形成了两种治理国家的理论原则，这两种原则如此富有弹性，使得它们之间的界限常常模糊不清，因为民主可以包括所有人，也可以仅限于其中半数人口；另一方面，贵族制可以包括半数人口，也可以只包括相对较少的一部分人口^①。这样，两种形式的政府体制并不是截然分立，而是在 50% 的人口参与权力系统的那一点上交叉。

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至少在宪政得以发展的一些重要地区，严格的古典意义上的贵族制已被彻底摧毁。即便那些保守派政府也时常给自己披上民主的外衣。面对追求民主的大众的强大声势，贵族制早已抛弃了其原初的形式，且欣然改头换面。今天它还是绝对专制体制，明天则摇身一变成为宪政体制，后天却成了议会体制。在贵族权力相对来说仍然不受限制的地方（如德国），贵族们无一例外地诉诸于上帝的恩典。然而，当他们仍觉得没有太大的安全感时（如在意大利），他们在上帝恩典的基础上再加上民众意志。从外表上看，贵族制自身可做出最大限度的修正。在君主制的法国，纳瓦拉行省法兰克地区的君主（*the Francia et Navarra Rex*）一变而成为法国国王（*the Roy de France*），而法国国王进而变成法国人的王（*the Roi des Français*）。

^① 译自 J.J. 卢梭：《社会契约论》（*Le Contract Social*），《民族丛书》（*Bibliothèque Nationale*），第 6 版，巴黎，1871，第 91 页。

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从理论上讲,政党活动要比国家更倾向于民主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党是建立在多数原则基础之上的,而且总是奉行大众原则。这样,贵族制下的政党必然使其原本的贵族色彩大为削弱。虽然这些政党在其性质上仍然是反民主的,但在某些时候,在政治活动中,政党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接受民主信条,或至少为自己戴上一副民主的面具。而民主制度诸原则从其性质上说,由于大众意志和多数的变化无常、游移不定,使得国家和民众的活动往往变动不居,这在理论上正好应验了赫拉克里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希腊文 Πάντα ρεῖ) 的说法。保守主义者却试图将自己的原则建立在某种一成不变的基础或规范之上,这种基础或规范经历史证明是最好的或无论如何也不是最坏的,并最终被认为在永恒事物的层面上(*sub spèce aternitatis*)是正确的。我们不应将保守主义者所倡导的原则简单地理解为无条件地维持现状(*Status quo*)。如果他们仅仅认同于既存的一切,即在一个国家或一定的时期被法律认可的东西,那么,保守主义者无异于自取灭亡。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某一阶段,旧的保守势力被排斥于权力系统之外,并被以争取民主为旗帜的革新派所取代,这就使保守派对现有的国家秩序持一种敌对的立场,有时甚至于走向革

命式的激进主义。^① 这样，保守派所坚持的立场将会发生一定程度上的畸变，从先前奉行贵族式的出自本能和信仰的排他主义，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平民式政党。认为只有大众才能埋葬民主体制，恢复古代贵族制的纯洁性，这就使得原来的保守主义者逐渐转化为民主主义者。他们充分认识到普通民众的遭遇；与共和国时期的法国保皇党人一样，他们逐步与革命无产阶级携起手来，反对民主资本主义的剥削，支持甚至帮助扩大劳工组织——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摧毁共和制，从而恢复君主制，后者是贵族统治原则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国王和他的穷弟兄们(*Le Roy et les camelots du Roy*)将联合起来摧毁富豪们的寡头统治。必须通过大众意志的民主途径消灭民主。民主是恢复贵族制往日荣光的惟一可行的途径。而且，保守主义者并不常常等到自己被逐出政治舞台时才将目光转向普通民众。在像英格兰这样的民主国家，保守派会同时将注意力转向工人阶级，只要后者构成了民众中最明显的支持者群体。同样，在那些不存在议会体制而民众却拥有普遍而平等选举权的国家，贵族派

① 例如，1830年，劳默(Raumer)在巴黎对这一问题作了很好的表述“他们所有人(即自由派)将一切试图推翻旧制度和罪恶的行为均视为革命的，而将所有试图恢复原有制度和其他弊端的行为视为反革命。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则将革命视为一切蠢行和罪过的总和，在他们眼里，反革命意味着重建秩序、权威、宗教，等等。”弗利德里希·冯·劳默(Friedrich von Raumer):《1830年巴黎与法国书信集》(*Briefe aus Paris und Frankreich im Jahre 1830*),布罗克豪斯(F. A. Brockhaus),莱比锡(Leipzig), 1831年,第二部分,第26页。亦可参看威廉·罗舍尔(Wilhelm Roscher):《政治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历史学》(*Politik, Geschichtliche Naturlehre der Monarchie, Aristokratie und Demokratie*),科塔(Cotta),斯图加特—柏林(Stuttgart - Berlin), 1908年,第三版,第14页。——不过我们应当记住，在政治活动中，做出这样的价值判断或许有助于实现某些政治的甚至道德上的目标，但如果我们用来概括一种历史趋势或观念，便会将我们自己带入歧途。

也常常仰赖于大众的支持,不过从心底里说,他们却反对给予大众以政治权利和参与政治的能力。在选举期间,自我保护的本能迫使原来的统治者从其觊觎的高位上退却,并利用同样的民主和煽动策略以图再次获得权力,这也是最年轻、最桀骜不驯、最不开化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所运用的策略。

如今,贵族制要维持其统治不是通过议会,而是要通过其他途径才能实现。在大多数君主体制中,并不需要通过赢得议会多数而获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权。然而,即便是仅仅为了装点门面并希望通过它引导舆论,在议会中获得足够的代表权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在议会中获得议席,贵族阶级既不是将自己的真实原则和盘托出,也不是仅仅寻求与自己趣味相投的人的支持。可以想见,一个仅仅寻求本阶级成员和那些与自己有着共同经济利益的人的支持的土地贵族,将无法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任何席位,在议会中也不会获得任何代表权。一位持保守立场的政治候选人可以向他的选民说,他们对国家的命运并不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他们的选举权应该被取消,这个候选人的这一番话无疑是肺腑之言,但在政治上,说这些无疑是愚蠢的。如果他想跻身议会,途径只有一条,他必须以民主主义者的姿态进入选举舞台,他必须屈就以同行的口吻安抚农场主和农场雇工,必须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是联在一起的。这样,贵族们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服膺于一种连他们自己都不接受甚至在心灵深处厌恶的原则。贵族的全部目的在于:获得权威、维持限制性选举权,以及当普选权危及到本阶级传统特权地位的时候,寻求限制普选权的方法。不过,既然他认识到民主已经成为时代压倒一切的主题,如果依然公开坚守自己原来的政治原则,将不会有望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他极力掩饰自

己的真实想法,与民主这群狼一同嚎叫,以确保那个让人垂涎的多数。

普选权的实现对保守派候选人的行为外观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以至于当持有相同政见的两位候选人面对同一选民群体时,双方各自都不得不极力与对手划清界限,为此,他们的立场均向左移,即树立自己作为民主原则捍卫者的形象。

这一点也有助于说明保守派为什么也会极力按照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行事,这一原则注定要取代‘被召唤者众,被选中者寡’这样的宗教格言,以及认为只有少数上帝的选民才是完美的这一心理学理论。用库尔提乌斯(Curtius)^①的话概括就是 除非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大众,仅仅依靠一少部分人的支持,保守派是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的。^② 旧的等级制度培养起来的保守主义思想尽管根深蒂固,也不得不戴上一种民主的假面具,至少在选举期间是这样。

同样,自由主义理论也不是首先将自己的理想建立在大众基础之上的,而是将某些特定的阶级(即那些有教养、有财产的阶级)作为自己的主要支持来源,这些阶级虽然还没有在政治上赢得各种特权,但在其他活动领域已趋于成熟。对自由派来说,头脑单纯的大众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邪恶罢了,他们的惟一作用便是成为别人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而这些目标对大众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德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自由派作家罗特克(Rotteck)曾斥责法国皇后在大革命期间迫使中产阶级向普通民

① 弗里德里克·库尔提乌斯(1814—1896),德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中译者。

② 弗里德里克·库尔提乌斯:《正义与政治》(Ueber Gerechtigkeit und Politik),“德意志评论”(“deutsche Rundschau”),卷 23,1897年,第 4 册,第 46 页。

众寻求支持。罗特克区分了两类不同形式的民主：由代表统治的民主和由大众直接统治的民主。^① 1830年六月革命期间,当时正好在巴黎的弗利德里希·劳默就悲叹不已,因为一旦大众攫取了权力,便无法‘将这一权力从他们手中夺走,除非惹恼他们,或者激起他们针对新的领袖的革命’^②。与此同时,劳默以其极端浪漫的笔调描述了滋生这种浪漫情绪的他的祖国普鲁士,在那里,国王和他的子民‘共同生活在高贵而纯洁的氛围之中’,中产阶级安于现状,不再要求更多的权利。^③ 研究北德意志帝国国会发源史的历史学家斯比尔 (Heinrich von Sybel)是又一位著名的自由派领袖,他自己就公开反对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因为在他看来(这只能从上面有关自由主义者对普通民众所持的观念中得以理解),这一权利必然预示着‘议会体制走向灭亡的开始’;是一种压倒一切的统治权。这促使他迫不及待地向德意志国王提出警告,要求后者不要将这些导致民主式专制的危险因素带进新生的联邦国家。我们亦可从自由派领导人对待贵族制及其原则的态度中发现自由派对大众发自内心的厌恶情

① “正是以路易十六为代表的极端君权主义者与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导致自由派走向了反对各种资产阶级观念和正在广泛传播的政治自由观念,这使得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所有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充满了罪恶的血腥和巨大的破坏力。而这些革命本来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正是革命的这种破坏性使得人民的代表为了避免自己被革命所吞噬而极力使民众站在自己一边;这就导致粗暴而无视法纪的暴民力量的失控,并最终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卡尔·冯·罗特克(Carl von Rotteck):《大众研究 自历史认识之初直至我们所处时代》(*Allgemeine vom Anfang der historischen Kenntniss bis auf unsere Zeiten*),赫德尔书店(Herdersche Buchhandlung),弗莱堡(Freiburg),1826年,卷九,第83页。

② 弗里德里克·冯·劳默(Friedrich von Raumer):《巴黎书信集》(*Briefe aus Paris*),前引书,第一卷,第176页。

③ 劳默(Raumer),前引书,第一卷,第264页。

绪。普选权的推行将预示着社会主义倾向在选民中或下议院很快占据主导,这样,正如罗斯切爾所说的,许多自由派对待国王和上议院的态度便开始发生改变,^① 将它们视为在立法过程中阻止下院议案立即生效的可能手段。罗舍尔认为,在“没有成熟的统计学知识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没有对各阶级人口数量关系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的条件下),扩大选举权是不可取的。^② 在德国,就连被认为是最接近社会主义的自由派团体——“国家社会主义者联盟”——最近也开始倾向于认为:“对国会中变化无常的大众意志于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施加必要的限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他们看来,应当存在一些独立于大众意志的贵族制元素,后者代表着谨慎,拥有否决权,从而形成一个永久的缓冲力量。”^③

在过去的一百年的时间里,从波尔泰克 (Polteck)到纽曼 (Naumann),德国的理论家们不遗余力地试图在理论上将民主制与军事君主制这两种本质上互异的体制高度统一起来。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尽可能地使君主制去封建化 (defeudalize),目的

① 罗舍尔 (Roscher),前引书,第 321 页。

② 同上,第 336 页。

③ 马丁·瑞德 (Rade)在一篇声援国家社会主义者赫尔梅斯·冯·格拉赫 (Helmuth von Gerlach)在马尔堡 (Marburg)的选举活动的文章中,就警告普选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如果我们的帝国国会 (Reichstag,即德意志帝国议会下院——中译者)直接操纵政府活动,决定国家的内政外交,那样,情形会大为不同。然而帝国国会只是我们政府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帝国国会之外,或者说在帝国国会之上,还有联邦议会 (Bundesrat),法律的制定需要得到帝国总理、国王和贵族的一致通过。当然,联邦议会并不总是反对通过帝国国会的制度程序传达出的合理的民众意愿;但只要它认为帝国国会的决议有失妥当,它将反对 (而且常常是这样) 该决议成为法律。这样,普遍选举权受到一定的限制,正如大自然限制树木的生长使其不致冲破云霄一样。幸亏我们的立法机构有两院,而不是帝国国会一院。”

是要用专业化权威代替君主制下的贵族监护统治。他们为自己确定的这一任务即使不是为所谓的社会君主制(social monarchy)奠定理论基础,至少也是在理论上论证大众式的君主制(popular monarchy)的可能性。显而易见,这一目标所代表的政治倾向尽管与科学精神毫不相干,但它并不必然与科学(是否是科学关键在于方法)背道而驰或者矛盾。既然这种倾向是政治性的,那么它必然是在科学的视野之外。这里我们没有理由将德国存在一种建立类似于七月王朝统治的倾向这一事实归咎于德国的知识人,因为这一倾向根植于政治生活。然而,要将那种主导普鲁士德国数十年之久的君主制与平民(或社会)君主制统一起来,不是有违历史吗?大多数德国自由派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错误在于将梦想当做现实。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混淆源于德国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后者自 1866 年以来一直极力掩饰自己立场的改变(即在党派倾向上走向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同时主动放弃从政治上完全解放德国资产阶级的所有企图),他们幼稚地认为,随着德国的统一,霍亨佐伦王朝的建立,所有(或几乎所有)新的民主要求将得到满足。即使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现代君主制(世袭君主制)的基本原则与民主制的原则是根本无法相容的。只要是建立在大众意志基础之上的,君主专制体制(Caesarism)仍可以是民主的,或至少在表面上是;而独裁君主制(automatic monarchy)则永远无法与民主政体相颉颃。

到这里,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概括 在现代政党活动中,贵族制俨然以民主的面目出现,而民主制中则往往渗透着贵族制的某些成分。一方面,存在以民主制形式出现的贵族制,而另一方面又有本质上属于贵族制的民主制。

政党活动往往以民主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这就使得那些

肤浅的观察家看不到它的贵族化甚至寡头化趋向。如果我们希望对这一趋势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最好对民主社会各党派特别是社会主义政党和革命劳工党的内部组织结构作一系统考察。除在选举期间,保守派政党常常总是趋于寡头化,那些抱有革命性目标的政党组织的寡头化倾向也丝毫不亚于保守派政党。对政党活动寡头化趋向的研究对于那些革命性政党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这些政党无论从其起源还是其纲领来说,都对这种趋向持否定态度,然而实际上,在它们反对寡头化的过程中自己却走向了寡头化。所以,革命政党组织中出现的寡头化现象,是所有试图实现某种确定目标的组织结构中寡头趋势的一部分。

从理论上讲,既然社会主义政党和民主政党的首要目标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寡头统治,那么这里的问题便是如何解释这类政党组织中出现的连它们自己都极力反对的倾向。对这一问题进行较客观的分析构成了本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今社会,由经济和社会条件导致的高度依附状态,使理想的民主制度变得无法实现,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在当代社会秩序范围内,在那些旨在推翻并以新的秩序取代现有秩序的诸力量中,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在何种程度上?)某些推动我们向理想的民主目标迈进的力量。为了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者说至少循着这一问题方向不断追问,我认为是相当必要的。

二、社会斗争的伦理外衣

认真研究过历史的人们都不难发现,所有阶级,一旦获得统治权,他们便努力将这种政治权力传给自己的后代。政治权力的世系传递始终是维护阶级统治地位的有效手段。这种世系相承的过程也表现在婚姻关系方面,后者一直是资产阶级维持本阶级家庭秩序及其附属要件的基础。在那里,为了保证本阶级血统的纯洁性,强调婚姻纽带的牢固性,严厉惩罚通奸行为,以及维护长嗣继承权。从目前所能得到的数量有限的史前资料看,我们似乎可以做出如下推论: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维护其世系血统的纯洁性,在于人的内趋本能(*innate tendency*),即当他们获取某种所有物之后,总是极力将其财产通过继承传给自己能够确认的合法后代。在政治领域,同样的趋势也屡见不鲜。在那里,由于人类所特有的先天本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经济秩序,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自然和心理因素,最终使政治权力也逐渐被视为可以作为私人财产而继承的东西。历史地看,与其他领域一样,在政治领域,那种极力将财产留给自己后代的父系本能(*paternal instinct*)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正是世袭君主制之所以能够取代选任君主制的主要原因。维护家庭于社会中获得地位的渴望始终是如此的强烈,正如加尼托·莫斯卡所指出的,当统治阶级的某些成员在没有自己的子嗣的情况下(例如罗马主教),他们也要努力建立一种严格的裙带关系网络,

作为他们自保和实现世袭继承本能的极端表达式。^①

贵族制往往通过两种方式建立：一是借助传统的复兴；二是新的经济力量的形成。即使在那些其政体原则、历史传统、民族心理特征等方面与贵族制格格不入的国家，也是这样。对于北美的民主主义者来说，他们生活在共和体制之下，对贵族头衔一无所知，当他们摆脱英国王权统治的时候，与贵族制也一刀两断。这种现象的出现部分是由于最近的发展：例如资产阶级集权（与之相伴的是社会权力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以及特权阶层的出现），以及原有的已定型的共和精神与古代欧洲的观念、成见和理想逐步达成妥协的结果。如今，由百万富翁、铁路大王、石油大王、奶牛大王等等为主体的贵族统治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即使新生的自由民主制度在美国已深入人心，我们仍不难发现（托克维尔在这一点上应对我们有所启示），美国人往往以自己出生于一个首先踏上北美殖民地的家庭而自鸣得意。^② 在这些原生的共和主义者中，“贵族的成见”仍是活生生的。即便在今天，在纽约州，那些有着荷兰姓氏和血统的家族构成了该州一个不可动摇的贵族势力，一个失去贵族外表的真正的贵族阶级。

17 世纪后半叶，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正处于迅速上升时期，他们对已经变化了的环境的适应能力甚至超过了他们对封建贵族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格调甚至心理状态的模仿能力。1670

① 加尼托·莫斯卡（Gaetano Mosca）：《民主制和贵族制的过去与未来》（*Il Principio aristocratico e il democratico nel passato e nel 'avvenire'*）（就职演说），帕拉维亚印刷所（Stamperia Paravia），都灵（Turin），1903 年，第 22 页。

② 托克维尔（Toqueville）：《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戈斯兰（Gosselin），巴黎，1849 年，卷二，第二部分，第 19 页。

年,莫里哀写了他著名的喜剧《贵人迷》(又译《布尔乔亚绅士》, Le Bourgeois gentilhomme)。舒瓦齐(Abbé de Croisy)属于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① 其先辈曾在著名的法国行政院审察厅(Maître des Requêtes and Conseiller d'Etat)中任职,他说自己的母亲要求他经常光顾贵族举办的家庭沙龙。^② 带着初来乍到者所特有的热诚,他们被统治阶级的精神和原则同化,一旦进入国家政权,那些仍然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重要人物便迫不及待地改换自己的名号。福凯家族(The Fouquets)、勒·泰利埃家族(the Le Telliers)、科尔贝尔家族(the Colberts)、菲利波家族(the Phélippeaux)以及德马雷家族(the Desmarets)等变成了带有贵族头衔的贝里勒家族(the Belle - Isles)、德·卢伏瓦家族(the de Louvois)、塞涅莱家族 the Seignelay)、德·莫勒帕家族(the de Maurepas)德·拉维耶家族(the de Lavillieres)、德·马耶布瓦家族(the de Maillebois)。^③在现代德国,我们亲眼目睹了在过去四十年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逐步被吸收进旧的贵族传统中,而且这一过程在最近迅速加快。^④德国的资产阶级正在日趋走向封建化。在这里,庶民(roturier)的解放所带来的惟一后果便是为他

① 穿袍贵族,大革命前夕法国的一个社会等级,仅次于第一等级天主教贵族——中译者。

② 阿贝·德·舒瓦齐(Abbé de Choisy):《路易十四时代亲历记》(*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 Histoire de Louis XIV*),范·德·瓦特(·Van De Water),乌德勒支(Utrecht),1727年,第23页。

③ 皮埃尔·爱德华·勒蒙特(Pierre Edouard Lemontey):《论路易十四君主制的建立》, (*Essai sur l' établissement monarchique de Louis xiv*),《Dangeau 的最新回忆》(*Nouveaux Memoires de Dangeau*)的附录部分,经作者同意再版,Deterville,巴黎,1818年,第392页。

④ 有关事例参见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十九世纪的德意志国民经济》(*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xix Jahrhundert*),Bondi柏林,1903年,第545页往后。

们原来的贵族敌人输入了新的血液和经济动力。那些新富的资产阶级除了融入贵族阶级外别无更高的奢望，他们希图从这一融合中得到攀附统治阶级的合法头衔，这种头衔不是通过努力争取到的，而是通过世袭权利先天获得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世袭原则（尽管有时它纯粹是一种虚构）极大地加速了社会的‘训练’过程，也就是说，它加速了新兴社会力量融入旧的贵族式生活环境的进程。

在新兴阶级与正在衰落的阶级之间激烈斗争的过程中——这种斗争虽然偶而声势浩大，但经常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因而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道德因素常常会派上用场，相互斗争的各方你来我往地争夺道德的阵地，以掩盖他们自己的真实动机。在这个民主的时代，道德伦理成了任何人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武器。在旧体制下，统治阶级的成员以及那些渴望成为统治者的人经常将他们个人的权利挂在嘴边。而民主制度则采取了更为圆滑、更为聪明的办法，它认为仅仅为了个人权利而奔走呼号，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如今，人们在公开场合的言行都是以人民或者共同体的名义进行的。政府及其反对派、国王与政党领袖、以上帝名义进行统治的专制君主和篡权者、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与那些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患得患失者，都是‘人民’；他们都声称自己的行动代表着全体国民的意愿。

由此看来，在现代阶级和国家活动当中，道德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主观虚构：任何政府都极力为自己的权力附上一种道德油彩；各种以政治形式出现的社会运动都带上一副博爱的面具。任何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政党在它们夺取权力之前，都要公开庄严宣布自己的目标是与少数人的专制统治作斗争，以正义的统治取代旧的等级制度。民主制度总是为那些能言善辩的

人们提供了舞台。他们所运用的语汇常常充满了类比和暗喻。民主土壤上成长起来的煽动家情感丰富，很容易为群众的痛苦所激动。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受害者呵护着他们的语言，而刽子手却陶醉于自己的眼水哲学。”^①任何新兴的社会阶级，当他们准备向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发动进攻时，总要为自己树立起“解放全人类”的大旗。当法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和教士展开斗争时，他们就颁布了神圣的《人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提出“自由（Liberté）、平等（Egalité）、博爱（Fraternité）”的口号。如今，我们亲耳听到另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工阶级运动的代言人声称，他们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并非出于某种自利动机，恰恰相反，他们的目标正是要将这种动机永远排除出社会过程。嘴里不断吟咏着他们前进的圣歌，现代社会主义者不无自豪地宣称，他们将“建立一个人道的、充满兄弟般互爱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阶级将完全消失！”

提出《人权宣言》并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所真正认同的不是民主而是共和。如今，“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口号只能在法国监狱的入口处看到。巴黎公社被誉为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府的首次尝试，并取得了短暂的成功。尽管公社奉行共产主义原则，并在财政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公社与资产阶级大财团一样，对法兰西银行始终忠诚不渝。我们已经历了许多革命，然而，我们却从未见证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建立。

不管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如何狭隘，与多数人的利益如

^① 莱昂·都德（Léon A. Daudet）、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夏庞蒂埃丛书》（Bibliothèque Charpentier），法斯凯尔（E. Fasquelle），巴黎，1898年，第142页。

何违背,它们都喜欢将自己视为人们普遍利益的代表,或至少认为自己能够得到全体公民的一致支持,并宣布自己以所有人的名义和福利开展斗争。只有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有时将自己的政党视为特定阶级利益的代表。但为了冲淡这种阶级性,他们又认为社会主义政党所代表的利益与全体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实际上,虽然不能说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但比起本身代表着少数人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来说,它仍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社会主义者们所说的与事实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即便一个政党能够代表或者相信自己能够代表的利益范围有多大,人类(humanity)和党派这两个概念本身在外延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社会主义政党向选民承诺,社会主义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而不图任何形式的索取。然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巨大差距使得这种承诺不可能兑现。给予预示着索取,如果无产阶级希望实现自己与德国的罗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s)^①、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②、洛克菲勒(Rockefllers)^③等经济上的平等地位,那么只有将目前被那些百万富翁垄断的生产资料及其交换社会化,那样,必然意味着那些资产阶级寡头们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的急剧减少。同样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社会主义政党所建构的理论(显然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发展出来的)将人

① 欧洲著名银行家族,创始人 为德国犹太人罗特希尔德。是 19 世纪欧洲经济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银行集团之一。——中译者。

② 美国从事运输业的大财团,1847 年由美国运输业巨头范德比尔特(1794—1877)创办,随后很快成长为拥有雄厚实力的运输业财团。——中译者。

③ 美国石油巨头,由洛克菲勒财团创始人洛克菲勒(1839—1937)于 1870 年创建。——中译者。

们划分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依附于这种生产资料的非占有者，进而断定所有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必然在精神上是资产阶级的，而那些处于依附地位的非占有者则必然是社会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渴望社会主义的胜利。这种观点完全是一种幻想，因为它将个人的收入——这一外在特征作为确定他的阶级归属惟一的或者说最主要的标准，并进一步将无产阶级的概念外延无限扩大，包括政府或非政府的所有雇员，从而宣布无产阶级政党是劳工阶级的政党，这样说在政治上也许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但在理论上却站不住脚。如果这一理论成立，克虏伯军火公司的老板和普鲁士总统也应该热衷于社会主义事业，因为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依附于生产资料的受雇者——即便他们仅仅意识到自己于社会中的真正地位（即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阶级意识”），也应该积极参加社会主义事业。

新生的解放运动中所表现出的理想化的狂躁情绪，被那些对民主抱有敌意的作家说成是无法实现的幻想，它追逐的是一缕青烟，出于特定人群利益的需要却要承担为所有人谋福利的重担。事实雄辩地证明，任何自诩为所有人谋利益的阶级运动必然难以自圆其说。人类若没有‘政治阶级’便难以为继，但从本质上讲，任何阶级只不过是社会的一部分人的集合而已。